

医理求真

DOI: 10.16305/j.1007-1334.2025.z20240702002

张从正攻邪体系中的药物分类原则及方药解读

朱思行, 王旭东, 严世芸, 陈丽云, 尚 力

上海中医药大学科技人文研究院(上海 201203)

【摘要】 张从正攻邪体系中的药物分类和应用原则, 是基于他丰富的临床经验, 参考药性分类, 并通过深入理解药物功效和作用趋势总结得出的。这些原则是连接攻邪理论与具体方药的关键环节, 不可或缺。通过回归张从正所处的历史语境, 明确攻邪三法与药物分类的关系, 尝试对汗法与茯苓以及吐、下二法与瓜蒂散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 为张从正攻邪体系的继承提供理论支持, 并为攻邪药物的认识和应用带来新的视角和启示。

【关键词】 张从正; 攻邪理论; 药物分类; 方药解读; 中医理论

Medicinal classification principles and formula interpretation in Zhang Congzheng's pathogen-expelling system

ZHU Sixing, WANG Xudong, YAN Shiyun, CHEN Liyun, SHANG Li

Institute of Science, Technology and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The principles of medicinal classification and application in Zhang Congzheng's pathogen-expelling system were derived from his extensive clinical experience, reference to the classification of medicinal properties, and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icacy and trends of medicinal actions. These principles are crucial for linking the pathogen-expelling theory to specific formulas and are indispensable. By returning to the historical context in which Zhang Congzheng lived,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ree pathogen-expelling methods and the medicinal classification. It also attempts to interpre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weating method and Fuling (Poria), as well a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emetic and purgative methods and Guati powder.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the inheritance of Zhang Congzheng's pathogen-expelling system, and to offer new perspectives and insights into the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f pathogen-expelling medicines.

Keywords: Zhang Congzheng; pathogen-expelling theory; medicinal classification; formula interpretati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heory

张从正, 字子和, 号戴人, 睢州考城县郛城乡(今河南省民权县王庄寨乡吴屯村)人, 约生活于金贞元四年至正大五年(南宋绍兴二十六年至绍定元年), 即公元1156年至1228年^[1]。张氏治学, 以《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为宗, 并私淑刘河间, 兼采百家之长^[2], 著《儒门事亲》十五卷, 论病首重邪气, 擅长汗、吐、下三法, 后世称其为攻邪学派的代表医家。

通过研究张氏《儒门事亲》及相关资料, 笔者认为张氏的攻邪理论及其三法的提出和应用构成了一个完

整的体系。然而, 这个体系指导下的药物分类问题往往未被注意, 以致学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此外, 金元四大家除张氏外均传承有序, 唯其旗帜鲜明, 但鲜有传人, 攻邪学派有名无实, 几至消亡, 后世医家囿于成见, 多有非议, 闻三法变色, 以致三法理论存而方药鲜见于临床^[3]。故针对以上两个问题, 笔者撰写此文, 一是提出张氏攻邪体系中的药物分类认识问题, 阐明其理法方药之间的逻辑衔接; 二是尝试对张氏攻邪方药进行解读, 探索药物使用的真意, 消除攻法“猛于虎”的成见, 回归攻邪理论本意。

1 张从正攻邪体系

1.1 理法方药一以贯之 张氏论病, 首重邪气。在《黄帝内经》“邪之所凑, 其气必虚”的影响下, 其以“病之一物, 非人身素有之, 或自外而入, 或自内而生, 皆邪气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ZD056); 上海市科委科技计划项目(22YF1449200)

[作者简介] 朱思行, 男, 博士, 副研究员, 主要从事中医各家学说研究工作

[通信作者] 尚力,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dr_shang@163.com

也”作为识病的重要观点。确立了“首重邪气”观点后,张氏根据天人相应理论,把邪气类别、侵邪途径以及人体部位三者对应,进行病因学的理论构建,指出“天之六气,风、暑、火、湿、燥、寒;地之六气,雾、露、雨、雹、冰、泥;人之六味,酸、苦、甘、辛、咸、淡。故天邪发病,多在乎上;地邪发病,多在乎下;人邪发病,多在乎中。此为发病之三也”^[4]。在《黄帝内经》及王冰关于三邪发病理论的影响下,张氏根据人体部位而三折之,分为上、中、下三部,故以“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的逻辑推断,提出祛邪的三大途径,从而确立汗、吐、下三法应用的可行性。需要说明的是,祛邪的途径与邪气侵入的途径并非简单对应,当视邪所停部位而定。必须强调的是,汗、吐、下不是目的,只是治疗方法和手段。同样,祛邪是为了通过“发腠理,致津液,通血气”,从而达到“邪去而元气自复”的最终目的,这种观念是承接《黄帝内经》“血气流通为贵”的思想,并发挥刘完素“血气贵流不贵滞”的“气液宣通”论而展开的^[5]。

至于三法的应用,张氏也有明确论述,指出“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凡上行者,皆吐法也”以及“凡下行者,皆下法也”的治疗大法。具体言之,除内服药外,汗法还包括“灸、蒸、熏、藻、洗、熨、烙、针刺、砭射、导引、按摩”,吐法还包括“引涎、漉涎、嚏气、追泪”,下法还包括“催生、下乳、磨积、逐水、破经、泄气”。对三法在治疗手段上的扩充,无疑也是对三法内涵的丰富及运用范围的拓展,故治疗所涵盖的疾病范围也随之大大增加,无怪张氏称“三法该众法”,而发“舍汗、吐、下三法,其余何足言哉”之感言。

在方药选择方面,张氏也是承接其攻邪理论的内涵而展开。使用汗法时,学仲景之辛温解表,用麻黄、桂枝之属;推崇河间的辛凉解表,用双解散、防风通圣散之类;还有针对表里俱病的大、小柴胡汤等。使用吐法时,内服外治兼用,如瓜蒂散内服治伤寒头痛,钗股、鸡羽从外部探引致吐等。使用下法时,或以承气汤类寒下,或以煮黄丸类热下,或以舟车丸类峻下,抑或以丸药缓下等,皆随具体病症而定。此外,在使用三法的同时,对疾病的预后、药物剂型剂量(包括非药物的刺激量)、药物毒副作用的解救方法等方面都做了详细的描述,可谓比较全面完备。

综上可知,张氏攻邪体系从表面来看,似乎已完成了从理论到方药的一以贯之。但笔者在教学和研究过程中发现,从攻邪理论的建立到具体方药的运用之间,尚缺少关键的一环,即张氏攻邪理论指导下三法对应方药的认识和分类问题,这是衔接其攻邪理论和具体方药的关键一环,也是构建攻邪体系的底层逻辑之一。

1.2 药物分类思想

攻邪理论是张氏的学术标签,之所以能自成一派,其学术体系的内在逻辑必然是自洽

的,而这个逻辑闭环的关键是其对药物分类的重新构建。对于攻邪药物,张氏按照汗、吐、下三法进行分类,虽遵《黄帝内经》“辛甘淡为阳,酸苦咸为阴”之旨,但又不囿于其统论诸药,故进一步指出“辛甘发散,淡渗泄,酸苦咸涌泄。发散者归为汗,涌者归于吐,泄者归于下。渗为解表归于汗,泄为利小溲归于下”。其中的淡味,如属渗者归为汗法,如属泄者归为下法。即把辛、甘、淡(渗)归为汗法,酸、苦归为吐法,咸、淡(泄)归为下法。由此,这种以五味归属药物功效的汗、吐、下三法的分类方法看似已经成立。

从《儒门事亲》“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凡在下者皆可下式”这三篇关于汗、吐、下三法的重要理论篇章来看,张氏从《神农本草经》中只选取了40味药作为汗药、36味药作为吐药以及30味药作为下药,再以五味统属、兼顾功效的形式作为划分依据进行分类,具体整理后罗列如下。见表1。

根据上述药物分类情况,笔者发现张氏虽言辛、甘、淡(渗)归为汗法,但仍把一些不属于上述汗法范畴的苦、酸味药纳入汗法中,其余吐、下二法皆有这类情况。需要注意的是,并非所有符合上述五味分类方法的药物都能归属到张氏攻邪三法归类范畴之中。至此发现,张氏攻邪三法中具体药物的分类与其药物理论的存在一定矛盾。对于张氏的汗法药物归类,萧国钢在其著作《儒门事亲研究》^[6]中把上述矛盾总结为历代本草学的变化、张氏不专恃通常的解表药以取汗及性寒味苦之品已被后世温病学家所习用等原因,并提出“这些药物都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开玄府’功效,故不可用一般意义的解表药来界定品评”。该解释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归结于“开玄府”则未免失之笼统,无法从攻邪三法的药物分类角度彻底释疑。

根据以上论述,笔者认为张氏攻邪三法的药物归类依据并非囿于上述的五味归属法则,而是在参考了药性的基础上,以药物的实际功效和作用趋势作为其三法指导下的临床实际分类原则和应用原则。这是以张氏攻邪体系的整体思想为划分依据的,相当于中药理论中的“升降浮沉”。依据其“发病之三也,处之者三,出之者亦三也”的逻辑推断,更有“凡在上者皆可吐式”“凡在表者皆可汗式”及“凡在下者皆可下式”三篇的篇名作为三法之功效和作用趋势的概括,进而在三篇之下又有“凡上行者,皆吐法也”“凡解表者,皆汗法也”“凡下行者,皆下法也”之解释,以及遵仲景“大法春宜吐,盖春时阳气在上,人气与邪气亦在上,故宜吐也”“大法春夏宜汗,春夏阳气在外,人气亦在外,邪气亦在外,故宜发汗”“大法秋宜泻,谓秋则阳气在下,人气与邪气亦在下,故宜下”之旨,皆可说明祛邪的原则应遵从因势利导的就近原则以及药物的实际作用趋势。另

表 1 攻邪三法中的药物与性味关系

汗法药物	吐法药物	下法药物	五味	药性
蜀椒、胡椒、茺萸、大蒜	—	—	辛	大热
—	—	巴豆	辛	热
荆芥、香白芷、陈皮、半夏、细辛、苍术	谷精草、葱根须	槟榔	辛	温
生姜	—	—	辛	微温
天麻、葱白	—	—	辛	平
—	轻粉	膩粉	辛	寒
青皮、薄荷	薄荷、芫花	—	辛、苦	温
—	郁金、常山、藜芦	—	辛、苦	寒
防己、秦艽	—	—	辛、苦	—
—	乌头、附子尖	—	辛、甘	温
浮萍	—	—	辛、酸	寒
—	皂角	皂角	辛、咸	温
—	—	猪羊血	辛、咸	凉
麻黄、人参、大枣	—	石蜜	甘	温
葛根、赤茯苓	—	—	甘	平
桑白皮	牙硝	—	甘	寒
—	—	牙硝	甘	大寒
—	参芦头	—	甘	微温且寒
附子、官桂、桂枝	—	—	甘、辛	大热
—	蝎梢	—	甘、辛	热
防风、当归	—	—	甘、辛	温
—	地黄汁	—	甘、苦	寒
—	赤小豆	—	甘、酸	平
—	沧盐、泽泻	—	甘、咸	寒
浓朴	木香、远志、浓朴	—	苦	温
桔梗	—	—	苦	微温
—	—	桃花萼	苦	平
前胡、柴胡	—	猪胆	苦	微寒
黄芩、知母、枳实、地骨皮	豆豉、瓜蒂、茶末、梔子、黄连、苦参、大黄、黄芩	—	苦	寒
—	—	大黄、瓜蒂、牵牛、苦瓠子、兰汁、牛胆、羊蹄苗根	苦	大寒
—	—	芫花	苦、辛	温
羌活	—	—	苦、辛	微温
—	—	朴硝、芒硝	苦、辛	大寒
—	—	泽漆	苦、辛	寒
升麻	—	—	苦、甘	平
—	—	杏仁	苦、甘	寒
—	—	大戟、甘遂	苦、甘	大寒
—	—	枳实	苦、酸	寒
—	饭浆	—	酸	温
—	铜绿	郁李仁	酸	平
芍药	—	—	酸	微寒
—	晋矾、绿矾、齑汁、青盐、白米饮	—	酸	寒
—	胆矾	—	酸、辛	寒
—	—	犀角	酸、咸	寒
—	沧盐	—	甚咸	寒
—	—	戎盐	咸	寒

注：表中中药名为原书记载，“—”表示未有记载。

外,张氏在“凡在上者皆可吐式”篇中曰:“曾见病治在上者,诸医尽其技而不效,余反思之,投以涌剂,少少用之,颇获征应。既久,乃广访多求,渐臻精妙。”其又在“汗吐下三法该尽治病论”篇中曰:“况予所论之法,识练日久,至精至熟,有得无失,所以敢为来者言。”以上两篇皆出自《儒门事亲》前三卷,乃张氏所撰原稿,虽药物的选取是“以《本草》考之”,但此为其立足于临床实际之感言,即是明证。至于发散、渗(解表)归为汗法,涌归为吐法,泄(利小溲)归为下法的论断,只能是就药性理论本身而言,也恰恰反证了这种药性分类的理论局限性并非张氏三法药物真正的分类方法。对性味、归经与功效的关系问题,近代医家叶橘泉亦持有相近的观点,其曰“自昔方书,未尝论药,即间有论之者,亦无非以色味分属脏腑,如色白味辛入肺,色赤味苦入心,殊不知药物入胃,有色变为无色,有味变为无味,断无因色味之不同而分入脏腑之理”^[7]。当然,对药物的分类、认识以及性味,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8],张氏的这种分类方法仅适用于其汗、吐、下三法的攻邪体系范围内,这就造成了后人不在其语境范围内,以今人之眼光去解读,只能是无从琢磨了。

对张氏及其攻邪体系而言,这种药物的分类方法立足临床切实可用,符合攻邪体系中气血怫郁的总体病机以及祛邪以达气血“贵流不贵滞”的底层逻辑,是全面系统认识攻邪体系的逻辑起点,也是攻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而在以往及现行的《中医各家学说》教材及教辅书中,关于张氏的篇幅几乎均未提及此内容,教师在授课时也常常因为难以解释而选择回避。这一问题的明确,可以弥补对其攻邪理论体系研究中的漏缺,有助于后学更好地理解攻邪理论。

2 张从正药物分类体系下的方药解读

由上述可知,张氏拓展了攻邪三法的内涵和应用范围,但与目前学界对三法的治疗及相应药物的认识不同。在明确了药物分类体系后,如何对其方药进行解读,又如何去看待这种与当前学界对方药认识的差异,进而继承张氏的攻邪理论和用药思路及经验等,是接下来要讨论的问题,并试举几例说明之。

2.1 汗法与茯苓 《儒门事亲·卷十二·汗剂》桂枝汤

桂枝一两 茯苓半两 芍药一两 甘草七钱

上为粗末,每服三钱。水一盞,生姜、枣一同煎,温服。

张氏桂枝汤,很明显是在仲景桂枝汤的基础上加了一味茯苓。张氏在“凡在表者皆可汗式”中认为,赤茯苓甘而平,性属淡味之“渗”,依据《神农本草经》其主“寒热烦满咳逆”的功效,可归属汗法。茯苓与桂枝的配伍,相比仲景而言,是一改平冲降逆之意而为宣渗之

剂,乃继承仲景五苓散之意,有宣渗解表、疏通玄府的特点,既合“渗为解表归于汗”之论,又强调淡渗、开通郁结之功效。临床上,此方可治疗小儿风水等症^[9]。从张氏汗法医案来看,宣渗相配较为常见,以宣为主,渗为点睛之笔。这正是张氏汗法精神与内涵的最佳佐证,无怪萧国钢认为“这是张子和在汗剂中最有创意的一首方剂”^[6]。

《儒门事亲·卷十二·湿门》五苓散

官桂 泽泻 猪苓去黑皮 茯苓去皮 白术 各半两
上为细末,每服二钱,热汤或新水调下。

此方与仲景五苓散药味相同,唯剂量不同。仲景五苓散用茯苓十八铢、桂枝半两,而张氏五苓散用茯苓、官桂各半两。由表2所示,官桂与桂枝同属张从正汗法药物,但张氏五苓散中茯苓用量较大,故两者相伍,发汗除湿之效远超仲景五苓散。此外,《儒门事亲》中排风汤、桂苓甘露散、葶苈木香散、白术木香散、大橘皮汤、桂苓白术丸、桂苓白术散等方中(赤)茯苓与桂枝(官桂)淡渗相配的情况屡见不鲜,广涉风、暑、湿诸门及兼治于外者,皆强调以淡渗之性解表渗湿、开通玄府,可见一斑。

《儒门事亲·卷六·腹满面肿八十八》

萧令腹满,面足皆肿,痰黄而喘急,食减。三年之间,医者皆尽而不验。戴人以瓜蒂散涌之,出寒痰三、五升;以舟车丸、浚川散下之,青黄涎沫岳平;复以桂苓白术散、五苓散调之,半月复旧矣。

《儒门事亲·卷十一·湿门》

凡妇人赤白带下,或出白物如脂,可服导水丸、禹功散,或单用无忧散,量虚实加减;泄论,服桂苓散、五苓散、葶苈木香散,同治湿法。或用独圣散上涌亦是。室女白带茶调散吐之;吐论,可服导水丸、禹功散泻之;次服葶苈木香散、四物汤、白术散之类则愈矣。治白带者,同泻湿法则是也。妇人有浊污水不止,亦同此法也。

以上两案对湿邪加身诸疾,就近祛邪后,仍可以桂苓相伍、宣渗相合以祛邪气,善其后而收其功。从现代中药学的认识而言,桂枝辛温解表的功效可归属解表药的范畴,而茯苓健脾利水的功效归属利水渗湿药。但对张氏而言,桂枝、茯苓同属汗法范畴,属于同一类药物。从知常达变的角度而言,前者可认为是汗法之常法,而后者可认为是汗法之变法,用常法治常病,以变法应变症,通常达变往往可以出奇制胜,处方灵活,故能屡起沉疴。基于张氏的药物分类思想,对于常法与变法之间关系的理解,确实值得深入思考和品味。

2.2 吐、下二法与瓜蒂散 《儒门事亲·卷十二·吐剂》瓜蒂散

瓜蒂七十五个 赤小豆七十五粒 人参半两去芦

甘草半两或三钱五分

上为细末,每服一钱,或半钱,或二钱,量虚实加減用之,空心,齏汁调下服之。

相比仲景瓜蒂散,张氏瓜蒂散以齏汁易香豉,增加了人参和甘草,前者助瓜蒂催吐,后者甘以缓急,与赤小豆相伍,和胃且解瓜蒂之毒^[10],既增加了涌吐的力量,提高攻邪疗效,又使吐不伤正,具有攻补兼施的作用。这种以攻为主、攻补兼施的例子在张氏医案中比比皆是。这与其首重邪气、祛邪安正的观点并不矛盾,相反,更体现了张氏胆大心细、注意顾护脾胃的用药特点。根据患者个体差异,张氏在药量上会作出相应调整,“每服一钱,或半钱,或二钱,量虚实加減用之”,绝非孟浪行事,是对常人非议其吐法为“洪水猛兽”之刻板印象的有力反驳。此方与张氏其他吐方之三圣散、稀涎散、茶调散等相比,最为平和,反映其顾护脾胃的思想,亦能体现其吐法运用中丰富的层次感。

《儒门事亲·卷十二·下剂》水煮桃红丸

黑牵牛头末半两 瓜蒂末二钱 雄黄一钱,水飞过用之 干胭脂少许

上以黄酒调面为丸,以水煮,令浮熟取出,冷水拔过。麝香汤水下。

水煮桃红汤出自下剂,其中的黑牵牛作为主药,具有攻逐水饮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药物组成中有一味瓜蒂。根据《神农本草经》记载,在张氏三法的药物归类中,既为吐剂,亦归于下剂。一个药物同时具有不同的作用趋势且应用于一张下法的方剂中,难免使人感到困惑与矛盾。虽然瓜蒂具有较强的催吐作用,但很显然,此处瓜蒂应作为下法使用。但如何保留瓜蒂下行的作用趋势而不发挥其催吐的作用,在煎服法中张氏给出了答案,即“麝香汤水下”。在“凡在上者皆可吐式”篇中,张氏曰:“瓜苗闻麝香即死。吐者,瓜蒂也,所以立解。”用麝香来止瓜蒂所致之吐,即用麝香来抑制瓜蒂涌吐上行的作用趋势,从而保留了其泄下的功用。这种相反相成的组方用药思路,似拙实巧,是矛盾对立统一中的发展结果,不仅能达到提高疗效的治疗目的,还能降低药物副作用。

3 总结

张氏攻邪药物的分类是攻邪理论指导下的创新性

发展,是对部分药物性能的重新定义和践行,这种药物分类别具一格,但始终离不开其基于大量临床实践后对药物功效和作用趋势的认识和总结。通过对祛邪三法和相应药物的解读,我们认识到攻邪三法并非字面之意,其内涵早就潜移默化于日常的临床之中。我们必须承认张氏攻邪理论的不完美,尤其是理论和实践之间的脱节,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完善与进步。本文对张氏方药的解读只是冰山一角,仅做抛砖之举,如何去解读他的其他药物尚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语境的变化,医家学术思想也随之嬗变,对治疗方法和药物分类的认知,会通过不同的视角而产生新的内涵,所以离开特定的理论框架和所处语境去谈药物性味和功效,往往容易出现误解。回归历史语境,对张氏攻邪理论和药物进行解读,是对其攻邪体系的继承,同样对现代临床而言也是一种创新。不妨这样去认识:目前临床上对疾病辨治的思路和对药物功效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早已暗合张氏的攻邪思想及其药物分类的原理。那么,如何在这种视角下进行继承和创新,是当下中医药理论挣脱桎梏所需要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严世芸. 中医各家学说[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07: 128.
- [2] 肖国钢. 张子和学术思想源流探[J]. 中医文献杂志, 2006, 13(4): 17-21.
- [3] 金悦彦, 刘鹏. 金代医家张子和医学地位变迁与攻邪论学术史研究[J]. 医学与哲学, 2023, 44(7): 76-80.
- [4] 徐江雁, 许振国. 张子和医学全书[M]//胡国臣. 唐宋金元名医全书大成.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8: 37-42.
- [5] 周斌, 黄鸿飞, 何宣华. 张子和“血气流通论”探讨[J]. 贵阳中医学院学报, 2009, 31(4): 2-4.
- [6] 萧国钢. 儒门事亲研究[M]. 北京: 中医古籍出版社, 1998: 36-37.
- [7] 叶橘泉. 叶橘泉实用经效民间单方[M]. 北京: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2015: 5.
- [8] 刘中唐, 赵思晨, 裴晓丽, 等. 《黄帝内经》五味理论之苦味新探[J]. 上海中医药杂志, 2025, 59(4): 46-50.
- [9] 薛益明. 张从正临证心法[M]. 北京: 学苑出版社, 2002: 101.
- [10] 柯雪帆. 伤寒论临证发微[M].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20: 186-187.

编辑: 马丽亚

收稿日期: 2024-07-02